

## 1948年冀鲁豫边区的迷信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

张春鹏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迷信活动是冀鲁豫边区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难题,关联着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其中1948年的迷信活动尤为活跃。频繁的烧香磕头、取水治病等活动承载着民众躲灾避祸的诉求,同时有的迷信团体也散布谣言、组织暴动,造成了群众思想混乱、社会动荡不安,这都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相悖。为此,1948年初边区党委就着手应对迷信活动,但部分地区强迫命令的做法反而使活动愈演愈烈。此后,边区党委从民众生存利益出发调整政策,纠正强迫命令的做法,兼具原则与弹性的工作方式扭转了先前局面。边区党委对迷信活动的应对作为系统性的工程,将发展经济、教育民众、稳定秩序、改善医疗等相结合,支援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为日后的乡村建设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1948年;冀鲁豫边区;中共应对;乡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5-0136-13

## Superstitious Activities in Hebei-Shandong-Henan Border Region in 1948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Response

ZHANG Chun-peng

(College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Superstition was a long-standing unsolved problem in Hebei-Shandong-Henan Border Region, which was related to the local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especially in 1948. Frequent activities such as burning incense and kowtowing, taking water to cure diseases, etc. carried people's demands to avoid disasters. Meanwhile, some superstitious groups also spreaded rumors and organized riots, resulting in ideological confusion of the masses and social unrest, all of which are contrary t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s revolutionary goals. Therefore, in the early 1948, the Border Region Party Committee began to deal with superstitious activities, however the command to coerce in some areas intensified the activities. Since then, the Border Region Party Committee has amended its own policies and orders out of the people's survival, and its working style with both principles and flexibility has reversed the previous situation. As a systematic project, the response of the Border Region Party Committee to superstitious activities comb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educating the people, stabilizing order and improving medical care, which supported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Liberation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rur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1948; Hebei-shandong-Henan border reg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response; rural construction

冀鲁豫边区辖山东、河北和河南的部分地区,连接东北和华中解放区,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对于冀鲁豫边区而言,当地迷信活动久远且活跃,烧香磕头、“神水”治病、扶乩请神、加入会道门等现象极为普遍。迷信活动成为乡村社会中的一部分,也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下文简称中共)对乡村社会的领导。

[收稿日期] 2022-05-10

[作者简介] 张春鹏(1995-),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目前学界关于中共对迷信问题的应对已有了相当丰富的研究<sup>①</sup>。其中郑立柱在研究中注意到了灾荒对敬神活动的推动作用,由此强调迷信活动的解决不能诉诸行政手段;李俊领从文化史的视角揭示华北根据地的迷信治理,侧重迷信治理与乡村社会的文化变迁;李玉峰细致爬梳了内乡县取缔会道门的过程,梳理了中共的解决机制尤其是领袖人物的祛魅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既有研究在关注中共政策之外亦注意到底层民众与迷信活动间的关联,尤其是灾荒对迷信活动的推动作用,但在灾荒之下的民众如何影响迷信活动、民众如何看待中共对迷信问题的应对等方面则尚有进一步丰富的空间。

生存困境之下民众对迷信活动并非纯粹信仰而是兼有利用的关系,这不仅使得迷信活动更为错综复杂,也给实际的应对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民众多基于生存困境参加迷信活动,而生存困境其实是整个乡村社会都面临的结构性难题。冀鲁豫边区党委在应对迷信活动时就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不再将迷信活动视为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关注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并且在应对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政策转向。实际上,边区党委对迷信活动的应对积极支援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对日后的乡村建设产生了持续性影响。故笔者以学界关注较少的解放战争时期为研究阶段,以冀鲁豫边区的迷信活动为研究对象,充分利用聊城档案馆和菏泽档案馆的馆藏档案<sup>②</sup>,尝试廓清生存困境下的民众与迷信活动的关系,展现更为复杂多样的迷信活动,揭示中共在应对迷信活动时的两难困境、积极调适及其深远影响,以期深化学界对乡村革命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 一、1948年边区迷信活动发展的背景

自从1947年4月豫北攻势起,国民党部队重点进攻陕北、山东,冀鲁豫边区被黄河分为黄河以南和黄河以北两部分。等到1947年6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为钳制敌军及方便刘邓野战军在大别山地区展开活动,陈粟野战军在冀鲁豫战场和豫皖苏战场等展开高度机动作战,这使黄河以南地区频频遭受国民党的扫荡和破坏。同时1947—1948年边区水旱灾害频仍,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生活困难和心理不安。在这一大背景下,1948年边区的迷信活动极为活跃,截至1948年6月下旬,一、二、四、六、八、九6个分区均发现过会道门的活动<sup>③</sup>。1948年迷信活动的活跃和发展,关联着当地的文化、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

迷信活动的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历史上当地迷信之风素盛,迷信组织繁多,迷信活动就相当频繁。在1774年8月清水教王伦起义就发生在其家乡寿张县。1861年八卦教在鲁西北起事,同年鄄城的陈凤山举白莲教旗抗清。此后因严重旱灾、饥饿所迫,“鲁西南几个县在大刀会的旗号下动起来了”<sup>④</sup>。除了因反抗活动而被人熟知的会道门外,更多的迷信团体并未参与到政治运动中去。迷信团体的活跃与该地社会动荡不安密切相关。战争频繁和政治腐败造成社会秩序失衡,土匪和盗贼蜂起,仅郓城县内“挂旗号公开抢劫者30余股,夜间合伙抢劫者数十股”<sup>⑤</sup>。因此“群众纷纷组织起来‘保家防匪’”,

① 相关研究可参加路遥:《民国山东秘密教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张桂华:《会道门组织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演变述略》,《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梁家贵:《民国山东教门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郑立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敬神活动与政府应对》,《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5期;李玉峰:《1949年前后中共取缔会道门运动考析——以河南省内乡县为例》,《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李旭东:《陕甘宁边区的巫神改造与社会控制》,《苏区研究》2021年第6期;李俊领:《抗战时期中共对华北根据地乡村“迷信”的治理》,《东岳论丛》2021年第7期。

② 聊城市与菏泽市作为曾经的冀鲁豫边区的组成部分,其馆藏档案存有这一时期迷信活动的相关材料,目前学界较少利用。需专门指出的是,当时干部出于汇报方便抑或是自身认知不足,把许多迷信活动的材料也都纳入到会道门中。这也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的迷信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细节。

③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会门问题向中央局的报告》(1948年6月27日),《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6页。

④ 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77页。

⑤ 山东省郓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郓城县志》,齐鲁书社,1992年,第11页。

以致这些地方村村拉起杆子会”<sup>①</sup>。另外连年的自然灾害使民众生活贫困,文化程度低且思想落后,“民间文化中含有许多鬼神成分”<sup>②</sup>，“火神会”“龙王会”等庙会众多,还有虫神、河神等信仰。正如时人分析:“没有机会受到教育的他们,不信神信什么?不信能使他们生命所寄托的土地不受水旱之灾的龙王信什么。”<sup>③</sup>这也是迷信活动得以发展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天灾人祸交织使得1948年的灾荒极为严重。1947年边区先旱后涝,据区党委的统计:“水淹面积达全区的1/4,水、旱灾达3/5([黄]河南未计入)”<sup>④</sup>,造成了普遍的粮食减产。内黄县桑村全村土地3723亩,光被淹的就有2241.2亩。昆吾县寨上村比较严重,荒地面积就达到了70%。等到1948年入春后,黄河以南地区普遍未下透雨,面临着旱灾的威胁。沿黄地区则面临着黄河泛滥的破坏,范县、寿张等处因黄河水涨而全淹或大部被淹,未收或歉收的村共计165个<sup>⑤</sup>。同时,国民党的抢掠扫荡极为频繁,在1947至1948年春这一时期,一、二、三、五、七分区因“严重的破坏与摧残,牲口、劳力、粮食、农具等损失惨重”<sup>⑥</sup>。在1948年的四次大“清剿”时,二、三、五、七4个专区共计“被杀群众2555人,被伤群众928人,被抓壮丁38441人,抢去牛、驴、骡、马100472头,被烧房子32842间,被抢粮食112062777斤”<sup>⑦</sup>。全区九个分区都有不同程度的灾荒,民不聊生,灾区人口光“四分区5个县估计有100万至120万人”<sup>⑧</sup>。周锡瑞曾指出:“农民可能是感到现世的生活岌岌可危,因此就愈加接受秘密宗教的救世学说。”<sup>⑨</sup>灾荒之下的民众生活无望,此时迷信团体则趁机鼓吹:“圣王下来两个白兔,说也是救灾救难的”<sup>⑩</sup>,迷信活动中宣传的“躲灾避祸”很好地迎合了民众的诉求和期盼,为迷信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国民党也在积极利用和扶植会道门等迷信团体。其实国民党在国统区也明确反对迷信活动,在1939年9月5日曾颁布《加强禁查社会群众神权迷信办法》,在1944年5月9日内政部又颁布《禁查民间不良风俗办法》。但国民党却在解放区积极利用和拉拢各种反动的会道门以攻击中共,大肆开展迷信活动。阳谷、清平和临清等市的国民党特务人员积极组织“一贯道”等多种反革命组织,制造和散布谣言<sup>⑪</sup>。四分区邱封县已破案的白孝衣会系国民党支持,奉蒋军第四绥靖区菏泽、定陶、曹县、考城、东明、长恒联庄会会长杨普河之命组织<sup>⑫</sup>。在八分区卫河县四区的神水活动中,日伪翻译王尽善之妻最先取水并积极宣传。特别在新解放区,国民党的操纵利用是迷信活动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当时正值《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敌特力量对《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造谣进一步造成群众思想混乱。在之前的土地改革和复查工作中,一些地区出现了打击面过宽的现象。在阳谷县三区的588户中农中“曾被伤及257户,占全数中农中的43.7%”<sup>⑬</sup>。在《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之后,各级党委又因忙于整党工作而忽视了对其宣传解释,野心家则趁机散布“刷大缸”“兴地主”“斗干部”等谣言,造成民众思想恐慌不安。普通群众因怕斗争、怕平分土地而不敢做长期打算,大吃大喝,进一步加剧了灾荒的发展。在

①《平息湖西无极道暴乱》,《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专题部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31页。

② 梁家贵:《民国山东会道门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③ 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编辑部:《山东省庙会调查(第一辑)》,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1933年,第5-6页。

④《冀鲁豫生产救灾报告》(1948年6月26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下,第56页。

⑤《冀鲁豫生产救灾报告》(1948年6月26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下,第58页。

⑥《冀鲁豫区生产救灾报告》(1948年6月26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第3辑文献部分下,55页。

⑦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编:《财经工作资料选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07页。

⑧《区党委关于春耕生产节约渡荒的指示》(1948年3月28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53—001。

⑨ [美]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⑩《关于会道门活动的通报》(1948年6月23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86—002。

⑪ 中共聊城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鲁西北革命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41页。

⑫《冀鲁豫区党委关于会门问题向中央局的报告》(1948年6月27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下,第68页。

⑬《关于补偿错斗中农的初步经验总结》(1948年6月26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86—031。



濮阳县五星集上“一集杀25头猪都卖掉”，“高陵县井店集猪肉锅增到30口”<sup>①</sup>。许多村干在整党和平分空气散出后也变得怀疑不安，干部普遍消极怠工，不愿领导生产。中农多持观望态度，大都“对不伤害中农表示怀疑，富裕中农更担心以后到底怎样抽地”<sup>②</sup>。相反，地主富农都较为积极，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地主要东西的现象。在阳谷，部分地主就“直接向贫农要地要房要东西”<sup>③</sup>。这样一来，民众思想极为混乱，干部消极怠工，故许多民众纷纷参加各种迷信活动。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民众大都支持参军和战勤工作但又怀有本能的恐惧和怀疑心理，这也推动了迷信活动的发展。战争离不开人力资源的投入，在1947年4月，区党委就反思：“扩兵成绩不够，扩大的数目不能满足纵队及军区兵团（主要是独立旅）要求军直武装的不够（数量）及缺乏拳头（独立旅人数很少）。”<sup>④</sup>因此区党委要求在1948年“克服一切困难，保证按期如数完成”<sup>⑤</sup>。同样战勤任务也很沉重，从刘邓大军渡河到1947年底的时间里就“动用民力约706994人工，约合工9927272天”<sup>⑥</sup>。民众积极参军支前，推动了战争局势的向好发展，但参军战勤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民众负担。为此中共积极解决军烈工属的生活问题，但实际过程中对军烈工属的照顾工作仍有不足，一些地方“对军属代耕管理不好，不经常或无人管理，以致使军属的土地耕作，粗糙不及时”<sup>⑦</sup>。这引发了一些军工烈属的不满，当时牛角店西街的互助组对军烈属照顾不够，组中成员徐延开的妻子只能给在外当兵的丈夫写信，叫他回家过日子<sup>⑧</sup>。同时参军和战勤工作更有生命危险，民众多怀有担心与恐惧情绪。迷信团体则大肆宣扬：“能练眼光，看见军队的行动就好躲”，“有隐身法护身法，打仗打不住。”<sup>⑨</sup>于是烧香活动盛行，工属军属占烧香者的多数，在尚和县皇姑冢的烧香者“均系青妇，向皇姑许愿，祝祷其儿子或夫平安回家”，南乐县仓颉庙的烧香者亦“以新参军之军属为最多”<sup>⑩</sup>。

此外，灾荒还往往诱发各种疫病，在1948年春天各地出现了痢疾、发热的情况。但当地的医疗资源本就落后，大部分民众生活困难而无法负担起医疗的费用，再加之先前土改中连关系到民生健康的药铺和医院也被斗争，使得群众看病更加困难。当时朝城的共和医院被斗后归群众经营，医生由群众控制使用，不得随便出门，“如城外请治病也得村里证明，农会批准”<sup>⑪</sup>。毛泽东在分析迷信活动成因时曾说到：“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sup>⑫</sup>所以一些农民生病后只能寄托于烧香磕头、取“神水”、降神治病等传统的迷信活动。

当地的迷信活动本就作为结构性问题而长期存在。等到1948年，边区的自然灾害使得民众生活困难、心理恐慌，国民党的扫荡破坏又使得当地社会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的能力受限，民众陷于生存

①《冀鲁豫生产救灾报告》（1948年6月26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下，第58页。

②《安定人心加紧生产》（1948年5月1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上，第595页。

③《关于进亡地主回村及向农民要地要东西搞交头活动问题》（1948年5月29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95—013。

④《冀鲁豫区王、张、张、刘、赵关于扩兵、土地改革等问题给薄一波的信》（1947年4月6日），《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上，第284页。

⑤《区党委关于动员参军工作的指示》（1948年1月31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56—004。

⑥《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半年战勤工作总结》（1948年初），《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上，第555页。

⑦《关于加强军工代耕与组织军工生产的指示》（1948年7月16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52—010。

⑧《几个村的互助生产零碎问题》（1948年），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111—022。

⑨《会道门中的口号》（1949年4月17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3—001—023—014。

⑩《关于揭发打击会道门活动的通知》（1948年4月27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47—030。

⑪《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本区工商业及几项主要工作向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报告》（1948年5月3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上，第600页。

⑫ 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9页。

困境而无法自拔,这推动了当地迷信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宣扬“躲灾避祸”的迷信活动因迎合了民众的诉求而活跃,但国共内战的大背景下也赋予这一时期的迷信活动以新的特点,实际活动远远超出了“躲灾避祸”的范围。

## 二、边区的迷信活动及其危害

当地迷信活动很大程度上源于民众对生存困境的回应,所以最常见的活动就是烧香磕头、取水治病。边区的烧香磕头活动极为普遍,在1948年鄆城一区的侯庄就发现新泰安神的活动,民众纷纷宣传泰安奶奶显灵,所以“香火日甚,烧香者随烧随走,络绎于途,最多时旧历四月十七日那天,有香客千余”<sup>①</sup>。南乐县五区吴村的仓颉庙因“仓颉庙中出现蛇,谣言随之而起”,日有香客千余者,波及方圆百余里的村庄<sup>②</sup>。尚和县五区李家庄皇姑冢因柳树着火而被传为“神火”,接着又传出皇姑为人指路的谣言,所以群众纷纷来皇姑冢烧香。同样传“神火”的还有茌平县四区,其中丁莫庄自旧历3月1日至18日以来发生火灾25起,烧毁5户,后被解释为“去年拆了镇武庙,神见了怪”<sup>③</sup>,于是民众纷纷修庙烧香。边区的烧香活动多以“古庙”“古冢”“神火”显灵为噱头,通过烧香等特定的仪式从而起到强化信仰的作用。

“神水”引发的取水治病活动也相当常见。所谓“神水”是指当地坑滩、深井中的水,敌特分子或神婆巫师往水中投药、投樟脑球后使水中有味,然后宣传为可以治病的“神水”。“神水”主要起源于冀南的武训、临清等地,在九分区内传播相当广泛。阳谷的神水活动源于四区的八里营村,该村农会会长发现坑水中有药味,于是“神水”开始流传,“每天来取水的很多,围坑祈祷焚香的经常有二三百人”。据烧香人说:“喝这水救灾救难,只传解放区,不传蒋管区。”<sup>④</sup>寿张一带的“神水”活动也相当普遍,一区的刘楼“神水十二天,来往烧香的不断来此”<sup>⑤</sup>。另外鄆城也有神水活动,“十区村庄发现神水,附近各村群众均去烧香取水治病”<sup>⑥</sup>。筑先的神水活动中,巫婆及坏分子也积极传播“王母娘娘,吕祖纯阳,七星临凡,药系药王所下,来救世治人”的谣言<sup>⑦</sup>,博平、东阿等地群众纷纷来取水。除了“神水”治病外,还有专门替群众看病以进行剥削自肥的迷信团体。在复程五区陈堂村中央无极道就强调入道后包治百病,但群众“入道后需摆三次炉”,“参道者每人平均出冀钞万余元,棉花十二两”<sup>⑧</sup>。曹县的泰山奶奶会要求入会时每人拿出1斤至5斤的麦子作为摆席费。可见,治病救人的迷信活动并非慈善性质,往往带有明显的经济要求。

国共内战的大环境下,游离于不同政治力量间的迷信团体也往往被其他政治力量利用,使迷信活动的“政治化趋势更加明显”<sup>⑨</sup>。部分迷信团体散布反动的谣言,在复程县的四、五、十一区中会道门就批评中共的扩军和秋征工作,鼓吹“反正是死,起来干了吧”等口号<sup>⑩</sup>。曹县有的迷信团体也提出类似口号:

①《通报〈我区发生会道门迷信团体活动情况〉》(1948年8月28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1—001—024—028。

②《关于揭发打击会道门活动的通知》(1948年4月27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47—030。

③《冀鲁豫区党委关于会门问题向中央局的报告》(1948年6月27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下,第69页。

④《关于会道门活动的通报》(1948年6月23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86—002。

⑤《关于会道门活动的通报》(1948年6月4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86—003。

⑥《通报〈我区发生会道门迷信团体活动情况〉》(1948年8月28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1—001—024—028。

⑦《冀鲁豫区党委关于会门问题向中央局的报告》(1948年6月27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下,第70页。

⑧《关于会道门活动情况介绍的通报》(1949年),菏泽市档案馆,档号:档0001—002—044—021。

⑨ 梁家贵:《民国山东会道门史》,第191页。

⑩《关于会道门活动情况介绍的通报》(1949),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1—002—044—021。

“八路军是仁军,地方干部强迫扩军,号召大家一齐动手,杀绝天下干部,哪村不动杀哪村。”<sup>①</sup>郛城等地的圣贤道打出的口号则相对隐晦,“八路军分土地我们劫富济贫,我们的徒弟参军出担架,不反对八路军”,但土地“分给穷人不好好过出了坏人,我们组织打倒这些坏人”<sup>②</sup>。除散布反共的谣言外,有的迷信团体也明确反对国民党,因为国民党的军队内成员复杂,迷信团体的成员与国民党军队中的土匪分子也存在矛盾。金县乡的一光两党道积极宣扬说:“《推背图》上讲,国民党不能保天下,共产党不能治天下,只有一光两党坐天下,这是天意。”<sup>③</sup>郛城三番子头目王金平的二儿子曾附体下神,他当时就鼓吹:“有我在中央军来了不占城,八路军来了不叫他占城。”<sup>④</sup>此类谣言、标语往往涉及对中共具体政策的攻击,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

迷信团体组织的暴动也时有发生,表现为迷信团体与中共之间的对立、迷信团体之间的倾轧,此类活动主要发生在中共控制薄弱的地区。如四分区的封丘、延津一带在1947年底1948年初时就曾发生会道门暴乱,杆子会攻击当地党组织和行署,还提出了“挡住八路军”“不出担架和慰劳队”等口号<sup>⑤</sup>。在1948年黄河以南地区的四次大拉锯中,国民党往往驱使“杆子会到解放区抢掠财物,制造赤白对立等”<sup>⑥</sup>。在1948年天津、济南解放后,当地的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也不停地窥伺时机,策反暴乱,曾在菏泽、定陶、成武、郛城、鄆城五县设有佛堂18个,发展了4000多名道徒,试图发动暴动<sup>⑦</sup>。除迷信团体与中共间的冲突外,不同迷信团体间的倾轧也极其严重。规模较大的会道门往往极力诱骗、吞并其他会道门,以扩大自身的组织基础。如中央无极道就经常散布帖子,制造谣言:“中央无极圣道居八卦的中心……九九归一,都得归他领导”,“中央无极圣道也是快门,比别的会门练得快,七天即可练成,成功的时间也快啦。”<sup>⑧</sup>曹县心平道的王树芳、孔善朝就被中央无极圣道用这种方式吞并。

生存困境之下的民众纷纷加入各类迷信团体,而民众的实用主义态度也赋予迷信活动以新特点。首先,活动范围更加广泛。此前活动主要发生在中共控制薄弱的地区,如1946年三地委的鱼台县就发生会门暴动,损失干部37人、边境生产人员4人和民兵枪支140余支<sup>⑨</sup>,南旺、复程等新区也接连发生暴动。在1948年,暴动谣言等活动在新区仍存在,同时老区和半老区的烧香磕头活动也更加猖獗,如东阿、筑先、寿张等地的“神水”活动。其次,迷信活动发展更快、规模更大但自身的凝聚力相对较弱。烧香、“神水”等活动传播迅速,规模动辄千人,活动范围经常数百里,但真正信仰的民众较少。部分民众对迷信活动的花销不满,曹县一参加活动的农民就曾表示:“典场得摆供,花费麦子共2斛(约30斤),还得买烟给传道师吸”,最后靠借钱才能还账<sup>⑩</sup>。此外因“神水”而殒命现象也不在少数,这都削弱了迷信活动的组织性。再次,相较于频繁的烧香磕头活动,武装暴动相对较少。武装暴动的减少离不开边区党委和政府的努力,也与民众的选择密切相关。许多民众参加迷信活动是为了现实利益,大多数人对迷信团体

①《为通报五地委复程、曹县取缔会道门工作的几点经验》(1949年4月12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2—002—084—021。

②《通报(我区发生会道门迷信团体活动情况)》(1948年8月28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1—001—024—028。

③《关于会道门活动情况介绍的通报》(1949年),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1—002—044—021。

④《通报(我区发生会道门迷信团体活动情况)》, (1948年8月28日), 菏泽市档案馆, 档号:0001—001—024—028。

⑤《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游击战争新区工作、黄河南整党情况向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报告》(1948年3月15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上,第541页。

⑥《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66—667页。

⑦路遥:《山东民间秘密会道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460—468页。

⑧《会道门活动概况介绍》(1949年),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2—002—068—027。

⑨《冀鲁豫区党委关于防止会门暴乱的指示》(1946年10月5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上,第145页。

⑩《为通报五地委复程、曹县取缔会道门工作的几点经验》, (1949年4月12日), 菏泽市档案馆, 档号:0002—002—084—021。



没有明确的认知更谈不上真正的信仰。当教首组织暴动时,民众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拒绝或退缩,毕竟暴动代价往往太高。加入迷信团体而又不完全信任的态度折射出民众对迷信活动并非纯粹信仰而是兼有利用关系。

不可否认,各类迷信活动能够为民众提供一定的益处。“在道有神保佑百病不缠身,有病者下药能好病”“能躲灾躲难”等迷信口号对于民众有着很大吸引力<sup>①</sup>,往往起到暂时慰藉民众的作用。此外在传统乡村社会,地主乡绅在灾荒之年会施放粥饭、救济难民,这是传统社会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土地改革以后,土绅、地主的土地财物逐渐被平分,社会自救的经济基础被逐渐削弱。迷信团体则利用社会自救的空白地带进行传教,“如郓城三区周垓村于五月间发现一贯道,放粮共放了七百余斤,发放的对象是济宁以南逃难来的灾民”<sup>②</sup>。迷信团体发放粮食和成员间互助等活动,对于缓解灾荒具有一定的作用。

但迷信活动的积极作用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危害性。首先,各种迷信活动耗资巨大,造成民力和财力的浪费,谢觉哉曾将农村的迷信治病活动形容为专吃农民血的“耗子”<sup>③</sup>。阳谷的烧香活动“每天香钱不下十万多元,加上人工、盘费,每天耗资很大”<sup>④</sup>。寿张刘楼在取水期间“有上供、烧香、烧纸元宝(每个二百元),还有烧饼、果子,花钱甚多。这样算一算,均合每人六百八十元”<sup>⑤</sup>。因迷信活动而丧命的人也不在少数。如刘楼副会长的母亲受风寒后取水治病,“灌了两瓶,六月八日喝了一瓶,九日就不能起床了,再请先生治病,已经晚了,到晚上就死了”<sup>⑥</sup>。其次,避灾躲祸的迷信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民靠天吃饭的思想,造成了“见到阴天就动摇,见到下雨就悲观”的局面。这不仅与中共积极的生产救灾思想相左,更不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再次,迷信活动散布的谣言和口号有着明显的意识色彩,与中共的主张理念相左。对中共的恶意攻击也造成民众的思想困惑,威胁中共自身的合法性。

国共内战的背景下,实际的迷信活动往往超出躲灾避祸的范围,部分地区的暴动谣言亦有发生。但整体而言,暴动谣言影响相对较小,这也与农民的实用主义心态有关。迷信活动作为民众的谋生策略之一,折射出生存困境下民众的忧虑。但同中共积极的生产救灾相比,迷信活动作为一种相对消极的应对方式,其危害极大。

### 三、中共初期的应对及困境

对于各类迷信团体及其活动,中共的态度经历了从利用改造到明确反对的转变。早在抗日战争初期,边区党委也曾积极利用过会道门等迷信组织。在1938年4月毛泽东等在给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的指示中就要求:“对于会门土匪采取慎重的态度去应付,依据具体情况可能条件打进去改造他们。”<sup>⑦</sup>这一指示既是基于各地迷信团体实力的考虑,也是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客观需要。同年5月份彭真也强调:“对会门仍要坚持争取方针,只对于其中少数汉奸分子才可采用严厉的制裁方法。”<sup>⑧</sup>不同于国民党对会道门等迷信团体的操纵,中共在利用之余更侧重思想改造,“进行政治工作,争取他们”<sup>⑨</sup>。在冀鲁

①《会道门中的口号》,(1949年4月17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3—001—023—014。

②《通报〈我区发生会道门迷信团体活动情况〉》(1948年8月28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1—001—024—028。

③ 谢觉哉:《农村里的“耗子”》,孙晓忠、高明编:《延安乡村建设资料(一)》,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91页。

④《关于会门活动的通报》(1948年6月23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86—002。

⑤《关于会道门活动的通报》(1948年6月4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86—003。

⑥ 同上。

⑦《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506页。

⑧ 彭真:《论冀鲁豫红枪会工作》,《群众》第1卷第23期。

⑨ 周恩来:《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8页。

豫边区,当时大刀会、天门会等迷信团体都曾被改造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队伍。等到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军和国民党的拉拢,会道门等迷信团体日益反动,边区政府只能对一切受敌利用之秘密结社严加取缔<sup>①</sup>。在解放战争时期,边区对迷信活动的政策基本上沿袭抗日战争后期的做法,对各种反动的迷信团体持禁止态度。在1946年冀鲁豫边区发生会道门暴动时,边区党委要求“采取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方针,迅速镇压瓦解,以求平息”<sup>②</sup>。只不过当时的举措大都流于形式,实际效果不佳。

1948年初,面对迷信活动的活跃,边区党委着手应对。但边区党委对迷信活动的新特点掌握不及时以及干部的麻痹大意,致使许多干部对迷信活动的应对存在不足。许多干部都认为:“老区、半老区曾有我多年工作基础,并经过土改复查,群众有相当觉悟,而群众烧香事件又多系无组织性的活动,即有个别野心分子从中挑拨是非,亦无足挂略。”<sup>③</sup>毕竟同政治暴动相比,烧香磕头等活动方式更为温和。加上整党工作开展以来,存在着“否定一切不相信现有村级领导组织”的情况<sup>④</sup>,这也造成部分干部思想焦虑、工作积极性不足。一些干部甚至直接参与到迷信活动当中,干部取“神水”的现象极为常见,寿张县南台村农会副会长就曾为生病的母亲接神水<sup>⑤</sup>。观城的一些村干党员对“神水”活动多抱着“好不好再说,反正不花钱”的态度<sup>⑥</sup>。更有甚者,阳谷四区八里营的“圣水”活动就由当地农会长率先发现,“他把坑边小庙扫的光光的,并派儿童团站岗,不叫洗脸洗东西”<sup>⑦</sup>,这些行为直接推动了当地“神水”活动的传播。毕竟规模较大的烧香活动往往伴随着集市贸易,会给该村带来丰厚的收益,所以村干对于这类活动也间接支持。

因初期的应对中存在麻痹大意的倾向,当地迷信活动发展愈演愈烈。群众烧香等迷信活动的发展速度极快,往往涉及方圆数百里,迷信活动动辄千人。如阳谷的“神水”活动波及范围较广,“从临清南传来的,经过冠县城北十八里处到城庄,遇聊阳县沙镇、安乐镇,到徐翼,又到阳谷”<sup>⑧</sup>。相较于一般性的迷信活动,谣言也逐渐盛行。内黄一区部分村庄内有人开始造谣:“世界大战已爆发,俄国军队进到长春60万,美国也正在进兵。”<sup>⑨</sup>鄆北九区发现了德天道的活动,借口蛤蟆神来攻击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红蛤蟆说别看我红,要人家的东西也不行;白蛤蟆说别看我白,谁的东西要归谁;花蛤蟆说别看我花,谁的东西谁也不当家;大蛤蟆说别看我大,谁来了我也不怕”<sup>⑩</sup>。南乐二区大青集的红枪会头子李振海(道号刘宗先)更是策动了千余户的流民和被斗户,以神仙叫他们拜把子的幌子而举行集会,并秘密部署“二月二、三月二”或“早晚有一天”要起事<sup>⑪</sup>。迷信团体作为由特定迷信思想组织起来的组织,其宣传的口号与中共的革命目标相悖,同时迷信团体在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与中共争夺群众基础,所以迷信活动中对中共进行攻击也就不难理解。

①《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取缔非法秘密会门防止敌奸利用活动》,《解放日报》1942年3月30日第3版。

②《冀鲁豫区党委关于防止会门叛乱的指示》(1946年10月5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三辑文献部分上,第148页。

③《冀鲁豫区党委关于会门问题向中央局的报告》(1948年6月27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三辑文献部分下,第68页。

④《安定人心抓紧生产》(1948年5月1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上,第597页。

⑤《关于会道门活动的通报》(1948年6月4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86—003。

⑥《关于神水问题的经验》(1948年7月3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95—029。

⑦《关于会道门活动的通报》(1948年6月23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86—002。

⑧ 同上。

⑨《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本区工商业及几项主要工作向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报告》(1948年5月3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上,第606页。

⑩《通报〈我区发生会道门迷信团体活动情况〉》(1948年8月28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1—001—024—028。

⑪《冀鲁豫区党委关于会门问题向中央局的报告》(1948年6月27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下,第70页。



迷信活动的发展速度以及谣言的传播情况超出了许多党员干部的预期,他们这才注意到迷信活动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但开展工作时还面临着干部人数及其素质与繁重的工作极不相称的问题。拿烧香活动极为频繁的六区和九区来说,现有干部“不及原来之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者,量少质弱”<sup>①</sup>,无法担负起细致繁杂的工作。即便是新区,许多干部也“多系缺点较多或在中心区不易安插的干部”,“不是善于团结群众的坚强干部”<sup>②</sup>。因此这一时期主要采用的是党员干部协同公安部门进行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面对迷信活动中的各种政治口号和谣言,当时的党员干部很容易受到阶级斗争这一惯性思维的影响。在实际过程中,部分地区多侧重以政治手段来解决迷信问题,犯了强迫命令的错误。

在具体举措方面,强迫命令的做法主要表现为没收供具、禁止取“神水”、追特务根子等工作形式。面对“神水”烧香等活动时,一些干部不加区分而要求一律取消活动,存在着明显的强迫命令。针对“圣虫”显灵等活动,有些干部采取了“弄死长虫”“搞掉神袍”“推倒碑纪”以及“民兵扣巫婆”的办法<sup>③</sup>。对于“神水”等活动,有的地方把群众灌的水摔在地上,这种做法“激起群众不满,反而增加了坏分子活动的资本”<sup>④</sup>。在尚和县李家庄的烧香活动中,当干部直接将皇姑庙寺庙推倒时,群众在夜间又偷偷地修起,于是谣言传播得更广<sup>⑤</sup>。在长清县七区的柳行头村发生了群众烧香活动,当时区村干部直接逮捕了七名烧香者,其他烧香群众不满便联系当地红枪会,随即红枪会派人前去支援,结果发生区村干部与红枪会成员间的暴力冲突。面对群众的不满情绪,许多干部“不从政策上、工作上、作风上检讨根源”,反而采取追特务根的方式。六分区齐禹赵堂闹“神水”,区村干部斥取水群众为“特务”<sup>⑥</sup>。这种“乱捕乱押极端错误的统治作风,等于火上浇油。”<sup>⑦</sup>

在以强迫命令解决迷信问题的地区,恐慌、不满、怀疑情绪也在群众中蔓延开来。对于迷信团体的成员而言,他们有四怕:“怕抓咱、怕老师、怕丢人、怕坏人。”<sup>⑧</sup>他们往往担心自身的命运,甚至可能走上更为极端的道路。有的农民说:“咱一辈子没做过坏事,这次办了个坏事。”<sup>⑨</sup>此类说法固然有为自己脱身之嫌,但也间接地反映了民众的恐惧心理。惶恐中还夹杂着不满情绪,如尚和县的许多烧香的群众并不说真村真名也不承认是军属,区干查问有的竟大哭大闹,高喊“有病不叫求医你们给看病,你们拿药费等”<sup>⑩</sup>。军属作为先进分子也参与到迷信活动之中,他们反映问题也是大多数民众遇到的困境。不难看出,在处理迷信问题时区党委遇到了民众直接或间接的抵制。迷信活动作为封建思想的表现形式确实存在严重问题,中共对其解决也是应有之义。但对于农民而言,迷信活动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期盼和向往。中共以行政命令解决迷信活动时忽视了对民众的思想和活动背后的诉求,反而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和不安情绪,强化了民众对迷信活动的参与。

同犯了强迫命令错误的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地区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开展工作,就起到

①《关于揭发打击会道门活动的通知》(1948年4月27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47—030。

②《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游击战争新区工作、黄河南整党情况向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报告》(1948年3月15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上,第541页。

③《关于揭发打击会道门活动的通知》(1948年4月27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47—030。

④《关于会道门活动的通报》(1948年6月23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86—002。

⑤《关于揭发打击会道门活动的通知》(1948年4月27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47—030。

⑥《冀鲁豫区党委关于会门问题向中央局的报告》(1948年6月27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下,第68页。

⑦《关于揭发打击会道门活动的通知》(1948年4月27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47—030。

⑧《关于会门政策的报告》(1949年4月9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3—001—023—013。

⑨《关于会道门活动情况介绍的通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1—002—044—021。

⑩《关于揭发打击会道门活动的通知》(1948年4月27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47—030。

了积极效果。在观城,起初部分区干部与村干部也想采取“填死水坑、截住取神水的人,砸碎瓶子等办法”<sup>①</sup>。对此县委明确批驳,认为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虽可能见点效,但不能解决群众思想问题,还会引发群众对我们的不满,更易为野心家们所利用。县委主张加强对民众的教育,利用具体事件、大会集体来宣传教育民众,同时还布置村干部积极到取神水的民众家中去个别调查,了解其生活困难并帮助解决。正因其实事求是的态度,当地迷信活动闹不起来。

在解决以普通民众为主要成员的迷信活动时又要维系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这为中共的应对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区以强制手段来解决教门问题而忽视了民生改善、思想教育等环节,结果使工作陷入困境,“越强制谣言越多”<sup>②</sup>。与之相反,有的地区则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注意并解决迷信活动所反映出的社会性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48年初对迷信活动的应对是边区党委解决迷信活动的积极尝试,为此后工作的调整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 四、中共积极调整政策

针对此前各项工作中的不足及弊端,区党委发出调整政策的号召,要求“贯彻具体政策反‘左’,端正政策,恢复生产”<sup>③</sup>。调整政策也为解决迷信问题提供了契机,各级党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多管齐下,开展了更有弹性的工作。

首先,区党委积极调整政策,纠正前期应对工作中的偏差和不足。“从政策上检查一下是哪些事办错了脱离了群众的,检查粗略立即根据地委关于端正政策指示加以纠正,端正政策、改善与群众的关系”<sup>④</sup>。针对前期工作中的不足,区党委强调:“谣言中所表达的群众对我们不满的情绪,对土改不满,对男女平等家庭民主不满,对战争的厌烦”,“群众性的烧香运动实际上是披上神的外衣,对我不满的群众性诉苦运动”<sup>⑤</sup>。烧香谣言等活动中并非都是诉苦运动,但中共将其定义为诉苦运动的做法本身就弱化了迷信活动的反动属性,标志着边区党委改变此前单纯以政治手段来解决迷信问题的思路。这一转变落实到具体的措施上,就要求“对道门迷信的问题的处理上不能用禁止或追查特务的办法”<sup>⑥</sup>。在发生过强迫命令错误的地方,要同群众承认错误,“并予群众以适当的补偿,以挽回群众对我们过去政策的不良影响”<sup>⑦</sup>。

调整政策后,边区党委扭转了强迫命令的作风,具体区分参与到迷信活动中的不同人员。当中共宣布取缔会道门团体时,许多普通民众感到恐慌,有的说:“怎么能把俺的会门帽子去掉?”为此边区党委认真考虑群众诉求,坚持了“分别对待、宽大处理”的原则<sup>⑧</sup>。对于一般参与迷信活动的民众,区党委采取了宽大处理、注意争取的做法。在复程和曹县等地,地方干部对入教民众给予热情的对待,宽大处理,“采

①《关于神水问题的经验》(1948年7月3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95—029。

②《冀鲁豫区党委关于会门问题向中央局的报告》(1948年6月27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下,第69页。

③《冀鲁豫区党委六月份向华北局的月终报告》(1948年6月26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下,第46页。

④《通报〈我区发生会道门迷信团体活动情况〉》(1948年8月28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1—001—024—028。

⑤《关于揭发打击会道门活动的通知》(1948年4月27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47—030。

⑥《通报〈我区发生会道门迷信团体活动情况〉》(1948年8月28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1—001—024—028。

⑦《地委对临泽县委员关于会道门活动破坏问题的指示》(1948年7月5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1—001—024—012。

⑧《为通报五地委复程、曹县取缔会道门工作的几点经验》(1949年4月12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2—002—084—021。

取了群众大会,再到人员座谈会、家家访问与个别交谈等办法,耐心地从思想上进行了阶级的、政治的、兵役政策的及迷信的各种教育,逐渐地提高,使其悔过自新”<sup>①</sup>。五地委也采取类似做法,“对一般会员回家生产,对小头子逮捕教育释放。一般会员不登记不悔过”<sup>②</sup>。临泽县还给“会门中的动摇分子、中间分子写信争取,并对坏的家伙也可以写信表明我们的态度,给他指明出路和前途”<sup>③</sup>。对于会道门中小头目也相对宽容,一般不逮捕,“非捕不可的,也要先作些必要的工作”<sup>④</sup>。宽大处理的做法打消了民众的心理恐慌,让其安心生产,民众都感慨:“共产党是好心眼,叫老百姓都学好。”<sup>⑤</sup>

对于教首及敌特分子,中共则采取通缉判刑的做法,以起到武力震慑的作用。区党委规定:“肃清残余反动力量,安定社会秩序,保卫大生产就成为我们军区部队的首要任务。”<sup>⑥</sup>在一八分区的做法是“对首要分子(如暴动领袖杀人凶犯)必须办理。有些确须执行枪毙者亦必须呈报区党委批准,但也不能多杀”<sup>⑦</sup>。同时还注意发挥民兵的作用,做到“在农村中一定做到武器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保证党对民兵的领导”<sup>⑧</sup>,夯实农村联防自卫的基础。

其次,边区党委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教育。迷信团体往往借助灾荒造成的恐惧心理来传教,将灾荒与“三世末劫”相联系,更有极端的会道门将灾荒与中共的征兵征粮政策相结合。这套说辞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灾荒的成因,也麻痹了群众思想。中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分析灾荒问题,重点解释蒋介石对边区的军事进攻和扫荡是边区灾荒发生的重要原因,从而更好地动员民众投身解放战争。同时民众对战祸的担忧相当普遍,“对胜利无信心而寄托在多传几张传单多活几年”<sup>⑨</sup>,这与全国的战争形势极不符合。故区党委强调要“深入发动群众宣传政策,并广泛地宣传我军胜利,揭发会道门的内幕黑暗和危害人民利益的严重性,提高群众觉悟”<sup>⑩</sup>。临泽县开展宣传活动向群众说明:“我们解放的日期已经不远,不久的将来即可能打菏泽,希望群众千万不要受了敌人的欺骗。”<sup>⑪</sup>各种宣传教育活动起到了很好的祛魅效果,教育了民众。

宣传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揭批迷信活动的落后性和欺骗性。迷信活动为了维持民众对其信仰,往往杜撰许多威胁性的谎言,如“咱们的道不准向外传,谁走漏消息就天大雾雷劈,一时三刻化为脓血”。有的迷信团体甚至威胁群众,“谁退就杀谁,谁往外说也杀谁”<sup>⑫</sup>。此类谣言欺骗性极强且反动,这一方面反映了先前所说的迷信团体凝聚力不足的现状,但另一方面也实实在在地阻碍了民众思想的解放。为此各级党委探索了各种工作形式,利用庙会、集市等来揭露迷信活动。曹县、复程等地“利用大集庙会,设置高台,让他们自述会门中的黑暗及他迷惑群众的方法,并在会议上把不准传六耳的神秘法语

①《为通报五地委复程、曹县取缔会道门工作的几点经验》(1949年4月12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2—002—084—021。

②《关于会门政策的报告》(1949年4月9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3—001—023—013。

③《地委对临泽县委员会关于会道门活动破坏问题的指示》(1948年7月5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1—001—024—012。

④《为通报五地委复程、曹县取缔会道门工作的几点经验》(1949年4月12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2—002—084—021。

⑤ 同上。

⑥《会道门活动概况介绍》(1949年),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2—002—068—027。

⑦《关于揭发打击会道门活动的通知》(1948年4月27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47—030。

⑧《关于会道门活动的通报》(1948年5月10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81—001。

⑨《通报〈我区发生会道门迷信团体活动情况〉》(1948年8月28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1—001—024—028。

⑩《会道门活动概况介绍》(1949年),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2—002—068—027。

⑪《地委对临泽县委员会关于会道门活动破坏问题的指示》(1948年7月5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1—001—024—012。

⑫《关于会道门活动情况介绍的通报》(1949年),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1—002—044—021。



高声诵读”,从而证明法语“如何不顶事,如何骗人”<sup>①</sup>,民众听后哄堂大笑。筑先公安局破获城区王小辫的造谣活动,让其到集市和水坑边进行自我揭发活动,“承认造谣惑众之错误,并着其当众求神附体,以事实证明其伪装”。民众经过教育后纷纷表示:“再不上当了。”<sup>②</sup>

再次,区党委将生产救灾与迷信问题的解决相结合,积极发展生产。区党委中分析南乐县的“神水”活动时就意识到灾荒与会道门的关联,会道门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人民负担过重,大军过境战勤支差及修黄河工程浩繁,而负担支差不合理,加上战争的损失,去夏过河时一次损失民工万余及耕牛大车等”,“群众缺粮缺柴生活困难”<sup>③</sup>。复程等地的党委也指出:“群众本身存有疾苦(如疾病流行,无力医治等)及长期由于战争(主要是拉锯区)切身问题不能马上解决,又加我们对目前形势宣传不够,群众感到战争无望,以至情绪紊乱,便于破坏分子煽惑。”<sup>④</sup>如果民众的生活困难不能解决,那么迷信活动则有可能继续发生。但受迷信活动的影响,农业生产中靠天吃饭的思想很严重,因“阴雨大种麦较晚肥料又少麦种有困难等而种麦情绪低落”的现象极为常见<sup>⑤</sup>。面对民众的消极等待现象,许多干部开始时觉得“生产不用领导,群众干的很好,咱领导是给群众添麻烦”<sup>⑥</sup>,结果使生产工作陷入了僵局。在1948年,区党委明确将“动员起来,组织群众春耕生产,节约度荒”作为灾区的中心任务<sup>⑦</sup>。面对南乐等地的烧香活动时,区党委认为“组织群众生产为目前中心工作”<sup>⑧</sup>。

中共不仅积极领导生产救灾工作,同时还身体力行地参与生产工作。如黄河以北的部分地委就号召“在重点区和一般区党政军民武每个干部人员,要具体帮助群众种地拉犁,耕地及用机关牲口种耕,直至春耕完为止。”<sup>⑨</sup>面对部分群众生产消极、不敢发家致富的现象,党员干部不仅带头参加生产,还积极解释宣传《中国土地法大纲》,“咱这老区半老区基本上是抽补不平分,中农不动”,以打破群众思想顾虑<sup>⑩</sup>。边区党委号召全体干部节衣缩食,提倡“少吸一盒烟”“少吃一顿菜”“少穿一双鞋”<sup>⑪</sup>。边区党委还积极鼓励二流子、巫师、神婆等参加生产劳动。二流子、巫师、神婆是迷信活动的主要推动者,主要依靠迷信活动来渔利,将其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破解迷信问题的重要步骤。同时,积极解决地主富农和中农的生活问题,解决过程本着“维持生活,搞起生产”的精神<sup>⑫</sup>。边区党委积极动员组织民众尤其是地主富农、二流子等参与生产运动,这不仅有利于推进生产救灾工作,也含有劳动改造的思想。

最后,边区党委还注意解决医疗卫生问题,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边区党委要求切实“解决群众的医药困难,首先需要恢复被斗争的药铺,召开医生座谈会,提出顾虑与误解,解决困难,号召为人民服

①《为通报五地委复程、曹县取缔会道门工作的几点经验》(1949年4月12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2—002—084—021。

②《冀鲁豫区党委关于会门问题向中央局的报告》(1948年6月27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下,第70页。

③《关于揭发打击会道门活动的通知》(1948年4月27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47—030。

④《关于会道门活动情况介绍的通报》(1949年),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1—002—044—021。

⑤《为大力领导群众突击种麦切实准备今冬明春灾荒的紧急指示》(1948年10月13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2—001—012—003。

⑥《莘县生产情况调查报告》(1948年10月17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102—008。

⑦《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春耕生产节约度荒的指示》(1948年3月28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上,第548页。

⑧《关于揭发打击会道门活动的通知》(1948年4月27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47—030。

⑨《地委会关于对各县春耕工作的指示》(1948年4月22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59—010。

⑩ 同上。

⑪《关于生产救灾募捐救济与春季优军紧急指示》(1949年4月13日),菏泽市档案馆,档号:0002—002—076—001。

⑫《冀鲁豫黄河南地县干部大会总结》(1948年9月9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下,第213页。

务”<sup>①</sup>。六分区在平县“神水”活跃,县委召集了一批医生开会,主动带药给群众治病,用“喝神水后病重病死者”的例子来教育民众<sup>②</sup>。同样在六分区河西县也专门组织人民到医院免费看病。诸如此类的做法很好地教育了民众,维护了民众的基本权益。

边区党委积极调整政策,切实解决迷信活动背后所折射出的现实问题,维护民众的生存利益。在迷信问题的应对中,区党委坚持原则的情况下兼顾弹性,避免扩大打击面,从而维持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稳定。尽管各地实际工作中仍有不足,但更有弹性的工作方式还是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打破了民众的思想顾虑,积极支援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 结 语

毛泽东曾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sup>③</sup>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是中共领导革命走向成功的关键。但在不同时期,民众始终面临着自然灾害和战争破坏等造成的生存困境。如何在支援战争的同时维持社会发展是对中共执政能力的考验,在解放战争时期同样如此。

为此中共积极开展生产救灾工作,尽可能地平衡好革命与生产之间的关系。相较于中共积极的生产救灾,面临生存困境的民众也有其自身的应对渠道,参加各种迷信活动便是众多的谋生策略之一。但中共和民众对于迷信活动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民众而言,迷信活动所鼓吹的“躲灾避祸”思想往往有极强大的吸引力,当然民众对迷信活动并非纯粹信仰而是兼有利用关系;对于中共而言,迷信团体宣传的躲灾避祸与中共主张的生产救灾相悖,造成物力财力的浪费,耽误农时,还威胁到中共自身的合法性。这一差异不仅折射出乡村革命中的传统思维与革命思维的张力,农民的生存权益同样牵扯其中,这样一来迷信问题更加复杂。

在1948年初期,冀鲁豫边区的部分党员干部以对待敌特的政治手段来解决当地迷信问题,忽视对民众生存权益的关注,结果强迫命令的做法反而对迷信活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等到调整政策之后,区党委不再将迷信活动视作单纯的政治问题,切实解决迷信活动折射出的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将发展生产、稳定秩序、教育民众、改善医疗相结合,兼具原则和弹性的工作方式维系了边区社会的稳定,也构成了中共整合乡村社会的关键一环。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迷信活动的应对主要是着眼于战争局势,打消民众的思想顾虑,增强民众对中共的认同和支持,动员民众积极支援解放战争。这与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对待迷信的态度和工作方式尚有一定区别。当然,实际应对工作中也蕴含着中共对乡村社会建设的规划和思考,为此后的乡村建设奠定了雏形,其中一些举措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仍有沿袭。如果说尊重和保障民众的生存利益是整个迷信问题解决的大方向,那么实际的工作还离不开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长期的思想教育,否则就会犯急于求成的错误。这也预示迷信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相当拉扯的过程,当地迷信活动的反复就是比较典型的注解。

(责任编辑:李良木)

①《关于会道门活动的通报》(1948年6月23日),聊城市档案馆,档号:G001—001—086—002。

②《冀鲁豫区党委关于会门问题向中央局的报告》(1948年6月27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下,第69页。

③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